

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文学作品对人有着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代替的教育意义，一般来说，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总是不断地在文学的世界里搜寻自己的精品，以期能够达到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目的。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又必然是始终围绕教育的终极目的，揣摩自身的情怀，抒写人、事、物，以期达到能够影响读者的认知领域的目的。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与教育工作者的结合是非常普遍的，在泰国华文新文学中也不例外。像摩南、曾心、毛草、老羊、梁风、梦凌、庄严、洪林等等，他们在作为文学家的同时，又是传道授业的教师，正应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往往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共有的现象。文学家总是善于把对社会和现实的思考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并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现实社会的巨大的影响作用，正如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所言：“文学就是教育”。

20 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火、苦难与抗争的历史，为了彻底改变中国文化与泰国文化中的矛盾和断层，以及泰国华侨的地位，泰国华侨及泰华作家们曾进行过艰难的探索和斗争，救亡和启蒙始终是历史的两大支点。由于教育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性质，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时代都为人们所关注，并把其作为实现历史目标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救国，通过教育实现个人的、家族的梦想，甚至是中国人民百年不灭的一场梦。正因如此，教育小说一直在泰国华文文学史上绵绵不绝，重新解读这些作品，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百年泰国华侨教育史，更重要的是能够深入了解百年泰国华侨的心灵史。

泰华文学从兴起迄今有着将近 90 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一波三折，在几度的起落之间，泰华文学顽强地生存着，并呈现出独有的文学特征。泰华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教育思想极为丰富的教育小说，这些教育小说通过塑造一系列文学形象表明了泰华教育小说作家的教育思想，反映了泰华教育小说作家的教育观念，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这些作品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研究泰华教育小说的教育思想对构建现代泰国华人华侨“和谐”的家庭教育理念有一定的借鉴、启示作用。

二、研究综述

尽管当代泰华文学作品中的教育小说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出现，但研究工作开始却很晚。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近 30 年的期刊全文中，涉及到泰华新文学的不足 20 篇，其中硕士论文 3 篇，专门研究泰华文学中教育小说的论文可谓微乎其微，当然也有零星的文章发表，但就这些而言，多数也只是作家与文本个案研究。而泰华文学教育小说和泰国华族教育的发展有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中泰文化的大交汇、大冲撞，以及在这一交汇与冲撞中的华人华侨角色及社会、文化的转型。无论是泰华现代教育小说还是泰华现代教育其实都是这一社会及文化转型的产物。由于文学和教育的渊源关系，他们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既共同承担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责任，又不可避免地互相之间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使文学与教育联姻，如中国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所言：“文学就是教育”。

正是基于对泰华文学中的教育小说研究现状的了解，笔者试图构建教育小说研究的新视角、新理念；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以新的眼光考察泰华教育小说，勾勒教育小说轮廓，展示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变化，力求在理论观照下仔细分析文本，给予教育小说成为泰国华侨教育理念及教育现代化的晴雨表挖掘泰华教育小说的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

本文也正是试图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上对泰华文学中的教育小说加以简论，并且从文学与教育结合的角度：综述西方文艺理论对教育小说的界说，结合泰华教育小说目前的发展，对泰华教育小说做出更合理准确的界说。

第一章从文学与教育结合的角度对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思想进行了概括，从而反观了泰华教育小说作家们所表达的家庭教育观念。第二章首先分析了泰华教育小说中所存在的家庭教育问题，然后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具体地分析了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在指导策略上给我们的启示，最后在充分肯定泰华教育小说的历史价值的同时，谈了泰华教育小说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几点启示。

三、相关概念界定

1. 泰华文学

所谓泰华文学是指生活在泰国的华人、华侨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泰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分支，也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泰国教育部统计，泰国 6300 多万人口中，有华人血统的泰国公民共计 1200 多

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由于泰国本土佛教弘扬仁义慈爱、和谐社会，所以至今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不分泰中民族。自从华人移居泰国后，中华文化就在泰国社会扎根并与泰国文化相融合。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泰华文学也呈现出两种文化相融合的特征。

泰华文学从兴起迄今有着将近 90 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一波三折，在几度的兴衰间，泰华文学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并呈现出独有的文学特征。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泰华文学的萌芽、泰华文学的第一次衰落、泰华文学的第一次复兴、泰华文学第二次衰落以及泰华文学的再次复兴五个阶段。

首先，从 1903 年第一份华文报纸创办开始到二战前期是泰国华文文学的萌芽期。泰华文学的萌芽是与泰国华文报刊发行分不开的。泰国第一份华文报纸《汉境日报》于 1903 年创办后，先后发行《华暹日报》、《同侨报》、《湄南公报》、《美南日报》、《启南日报》及《国民日报》等华文报纸，各报纸都辟有文艺副刊，不过其报刊政治内容较多，文艺内容部分很少。1919 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影响并给泰国早期华人华裔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泰华文艺界人士为了宣传中华文化，1937 年至 1939 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成立了 40 多个文艺社团”^{[1] (P182)}，其中方修畅（原名方柳烟）、铁马（原名郑开修）等人创办的“彷徨学社”，许征鸿、郭枯创办的“椒文学社”等著名的学社成就最大。华人学者热爱中国文学，创作并刊载了不少华文文学作品。

1939 年末至二次大战结束前期，由于前泰国军人政府的亲日政策，“銮披汶政府从 1939 年起至 1942 年止共颁布 12 个‘国民条例’通告”^{[2] (P35)}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许多泰国华文学校、华文报社纷纷倒闭。许多泰国华文文化界人士也先后返回中国，而留下来的华人、华侨作家们不是避难就是忙于经商以应付生存。泰国华文文学难以为继，并陷入了低潮。从此泰华文学走向了衰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60 年代中期是泰华文学的第一次复兴时期。“世界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提高了海外华人华侨地位，另外，当时中国政府对泰国采取了友善的政策，泰国政府方面也大大改变了对华侨的政策”^{[3] (P317)}，准许复办战争期间被封闭的华校华报。此外，受到战争的影响而返回中国的华人、泰华学者或泰华文化界人士也纷纷返回泰国，投身泰华文坛。复苏期的华文报

^[1] 赵朕, 芮华. 泰华新文学的衍变与展望[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1999 (2).

^[2] 张国培. 20 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史[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3] 陈贤茂. 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纸副刊和各种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华侨新语》、《半岛文艺》、《曼谷公园》和《七洲洋》最引人瞩目的。

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泰华文学的衰落期。“进入5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和西方帝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的封锁，中国方面也采取闭关封锁国门政策，从此再没有中国的新移民到泰国或其他地区。”^{[1] (P319)}此时的泰国也加入了西方阵营，使泰中两国断绝了正常的来往。同时，泰国国内发生内乱，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逆转。泰国华人华侨的活动再次受到限制，华校、华报因政治与经济的影响而纷纷关闭或受到严查。

70年代中期至今是泰华文学的再次复兴期。1975年7月1日，泰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泰关系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泰国政府对华文活动全面开放，使泰国华文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华社、华文教育的加强促使泰华文学走出低谷，从挫折中谋求发展。80年代，泰国的政治经济出现新局面，“1983年泰华写作人协会筹委员会成立，泰华作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2] (P117)}泰华文学出现新的繁荣。

2. 家庭教育

关于家庭教育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里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教育”。^{[3] (P140)}赵忠心的《家庭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按照传统的说法，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广义的家庭教育，应当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把家庭教育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教育，通常是指父母对儿女辈进行的教育”。^{[4] (P381)}台湾学者黄乃毓主编的《家庭教育》中认为：家庭教育强调在家庭里家人彼此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父母和子女是互相教育的。杨宝忠教授在《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中将家庭教育界定为：“家庭教育是指在人类社会家庭生活中，家庭构成人员之间的终身持续不断的一种教育和影响活动，它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自觉的或非自觉的、经验的或意识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多重水平上的影响；又包括家庭的社会背景、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环境因素对其成员产生的主体影响。在家庭生活的不同时期，这种影响的侧重点不同”。^{[1] (P86)}缪建东的《家庭教育社会学》中是这样说

^[1] 陈贤茂. 海外华文文学史 (第二卷)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2] 张国培. 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 [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0.

^[4] 顾明远主编. 教育大辞典 (增订合编本)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1] 杨宝忠. 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的“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生长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2] (P2)}

这些概念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家庭教育是指父母对子女所形成的影响；广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对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所有成员的教育包括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子女对家长的教育，甚至包括双亲之间、子女与祖辈之间相互产生的教育影响。诚然，人的成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就家庭形态来说，确实包括十分复杂的因素。我们在界定家庭教育对象的时候，既要考虑将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点，同时，也要特别重视子女在接受父母教育中对父母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所谓家庭教育就是在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教育和影响。

3. 家庭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问题一般指父母对子女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和结果，特指在父母对子女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障碍因素出现的失调现象。作为泛指的家庭教育问题，其实就是家庭教育本身，也即家庭教育作为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本文特指的家庭教育问题指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的失调现象，即家庭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

4. 家庭教育指导

目前学术界对家庭教育指导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清晰的界定，可供参考的是上海教科院的李洪曾先生对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的界定，他认为：“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是指家庭外社会机构组织的，以学前儿童家长为主要对象的，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霍霖霞在《天津市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分析及指导策略研究》一文中是这样定义的：“家庭教育指导是指借助家庭以外的力量对家庭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父母)在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的教育和指导。通过传授科学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或提供教育信息、组织教育活动等，提高家长教育教养能力和素质，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一种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指导可以是实施者主动寻求的，也可以是外界要求其进行的。”^{[3] (P2)}

^[2] 缪建东. 家庭教育社会学[Z].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 霍霖霞. 天津市流人口子女家庭问题分析及指导策略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7.

第一章 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思想的描述

第一节 泰华教育小说的基本内涵

作为小说的一种，教育小说历来是小说家、批评家的事。小说家作为教育小说文本的形成主体而得以阐发自己的思想，批评家作为教育小说文本的阐释者而借以存在。但是，作为小说之一种，教育小说又不完全是小说家、批评家的事。作为一个教育研究的反思者，面对教育学者与教育学科的诸多困境，从教育思想接受史的角度来对教育学者与教育学科的合法存在立法时，我们不得不坦诚的说，对于教育史，我们对其中的活性因素挖掘得十分不够，教育小说应该是其中之一。对于教育学者与教育学科的诸多困境，教育小说的研究不仅在于“解弊”，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条教育思想接受史的合理理路。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于什么是教育小说作一番考察。

一、西方教育小说界说

教育小说是来源于德语“Bildungsroman”一词，又译为“成长小说”、“性格发展小说”，艾布拉姆斯在他编著的《欧美文学学术语辞典》一书中为其下的定义是：“‘意为描写教育的小说或描写成长的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小说主人公从幼年时期起到成年的性格和精神上的成长，通常要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最主要的是要在经历过精神危机后变得更加成熟，这种成熟主要是指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中身份和角色的认识’”。^{[1] (P47)}另外，还有学者这样定义：“‘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来说，从德语文学中的具体范例来说，教育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合作者的过程”。^{[2] (P142)}二者对“教育小说”的界定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强调主人公要经历从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到成人这一时间概念，也强调了“成长”指的是主人公对自我的认识，是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成熟。这两个概念从整体全貌上给予限定，但没有进一步探讨教育小说的详细特征。相对而言，巴赫金定义更为精确。巴赫金理论将其定义为：“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

^[1] [美]艾布拉姆斯. 欧美文学学术语词典中译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2] [美]切莉·雷吉斯特. 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文献介绍,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
^(P230)他着重强调“教育小说”的两个特点，第一，小说中的主人公必须是“成长着的人物形象”，主人公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时必然因社会经验或人生经验的历练而有所成长，有所改变。然而在此处的“成长”不只是性格的成熟，也可能包括青春代理理想的破灭。其二，小说中的“时间感”必须是真实具体的，和社会背景、时代氛围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而这两个特点又必须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参与了历史的变化，而历史的变化也改变了主人公的个性等等，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历史的发展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

二、泰华文学中教育小说带来的困惑

当我们理清楚西方世界的教育小说源流时，再仔细考察泰华文学史上的“教育小说”不免有些尴尬。尴尬在于西方教育小说的所指，与泰华教育小说所指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当我们提到教育小说时，自然会想到五十年代李栩等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而这些作品，虽然有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这样的符合西方标准的教育小说，而更多的并非如歌德狄更斯的教育小说那样，描述着一个不成熟非理性状态的个体走向理性，走向成熟，即个体性格得以健康的发展，心智走向成熟的过程，而是将矛头直指当时社会教育制度的流弊，及家庭子女的教育观念、教育问题。显而易见，此教育小说不同于彼教育小说。西方教育小说的共性，如强调描写年轻人成长的历程等，如叙述主人公的冒险猎奇、艰苦求知等。但总的说来与泰华教育小说创作实际不尽相符。因此，有必要从泰华文学的实际出发，对“教育”小说的源流作必要的梳理。

泰中两国人民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关系密切。“1802年，《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被译成泰文，广泛流传。泰皇拉玛二世还降旨翻译《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和《东汉通俗演义》等”。^[2]^(P270)《隋唐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薛仁贵征东》等三十四部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分别在第一世王至六世王先后被译成泰文，中国的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在泰国受到各阶层的青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相近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泰国华侨华人慢慢地受到了从中国传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以新白话文

^[1] [俄]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 晓河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李君哲著. 海外华文文学札记[M]. 香港: 南岛出版社, 2000.

表现本国的社会生活和华侨华人心路历程的泰华新文学。另外，泰中两族普遍通婚，于是泰中两国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华人移民的到来也把中国文化艺术、中国民间戏剧、中国文学思潮、工艺等带到泰国，并且广泛流传。泰国人民对中国华人、中华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泰华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和泰华文学有着很深的源流关系。

在泰华文学史中最初没有“教育小说”这个词的使用，并没有赋予其特定的内涵，因此也就使“教育小说”这一名词的含义变得宽泛与模糊。我们从一些教育作品中，例如姚万达的《一个嚼槟榔的绅士》、陈竹的《三聘姑娘》、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和《座山成之家》等等，可以了解到：它们大多是揭露教育界种种问题或通过作品表达教育思想的，这与西方的教育小说有些许偏差。这就给我们对教育小说的界定提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也就是说，教育小说这一名词虽然由西方传入，但是在泰华文学中它的内涵产生了“变异”。简单说，西方教育小说更关注个体的成长，而泰华文学中的教育小说更关注教育中的“问题”，而且更多的是泰国华人华侨的家庭教育问题。但是，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舍弃西方教育小说的定义，而将教育小说限定于家庭教育问题小说，从而考察研究泰华教育小说，不免有失偏颇。在泰华新文学史上，确实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教育小说。如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和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含金量较高的专著以及文章问世，但对于作品文本的解读已经有所表达。因此，在本文展开之前，对泰华文学作品中的教育小说作恰当的而又合适的界说，是艰难而又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步骤。

三、泰华教育小说的界定

前文已经提到巴赫金曾在《小说理论》一书中的《教育小说问题的提出》中对教育小说作过详细的界说，他认为：“大部分小说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事件改变着他的命运，改变着他（指主人公）的生活状况用社会地位，但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则一成不变、依然故我。”而教育小说则不同于大部分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其中有“成长着的人物形象”，即“主人公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有着许多的“变数”，“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 (P229)} 巴赫金以教育小说的这一特点

^[1] 以上均引自[俄]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 晓河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为切入点，进一步将西方历史上出现的教育小说分为了五类，他的这种分析更多的是为了论证他的另一个主题，即小说的时间性。他指出了教育小说中对时间的把握和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从而分析这一不同带给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意义。我们从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独特的艺术鉴赏能力，但也使得教育小说的分类过于繁琐，遮盖了教育小说作为同一渊源的传承性。而泰华文学的学术界对于教育小说这一名词的应用也不做界定说明，只是含混简单的重复使用“教育小说”，或者简单的套用西方理论，寻找泰华文学的“教育小说”。从而忽略泰华文学的独特性，忘记了东西文学、中泰文学环境，特点等诸多不同。泰华文学中的教育小说与西方教育小说貌合神离，如果简单的套用西方理论，那么泰华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将首先从“教育小说”的世界中消失，如《风雨耀华力》，《人间垃圾》等一些优秀作品都会被淘汰。当然，除去这些作品，确有符合西方教育小说界定的教育小说变体，那就是以《破毕舍歪传》为代表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成长小说。这一类小说由陈仃的《三聘姑娘》，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等作品为滥觞，在泰华文学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界说的两难选择。无论以西方理论为标准，还是以泰华文学作家们约定俗成的“教育小说”观为标准，都会埋没一批优秀的作品，得不偿失。中国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石天河发表于1984年6月的《〈蝴蝶〉与东方意识流》，一篇似乎不相干的论文给我的思路带来了触动。文中强调了西方意识流的东方化，即，源于西方的意识流概念在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作家的创作性运用，从而产生了具有东方独特性的意识流。那么，由此反思泰华文学的教育小说，笔者认为，当教育小说这一名词以汉字形式出现于泰华学术界，它就已经有别于西方的教育小说。它必然按照独特的文学和社会环境轨迹发展。笔者认为，泰华文学的教育小说，在吸收西方教育小说的特点同时，更多融入了泰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独特的元素，从而具有泰华文学的独特品格，在20世纪的绚烂多姿的文学世界中，创造了属于泰华文学独特的教育小说史。在对教育小说做出界定前，有必要简单了解教育一词的内涵。教育，可分为狭义的教育与广义的教育。狭义的教育指被教育者，大部分未成年人，在特定场所例如学校、社会、家庭系统的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广义的教育是指人在广阔的社会中，在不断的与外界的接触中，增长知识，完善道德。西方教育小说理论，更多的将教育指向广义的教育。结合泰华文学教育小说的创作实际，我们更倾向于将教育限定于狭义教育范围之内，因此，教育小说指这样一类作品：叙述青少年在接受教育时期的成长故事，表现教育思想，揭露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弊端，批判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反思教育体制的作品。青少年接受教育，主要是

在校园，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样占据非常重要位置，因此，家庭教育小说与部分社会教育小说也归入论述范围。当然，为了避免论述的泛化与本论文的重点，即泰华教育小说中家庭教育观念的审视，在认真研究分析泰华文学 20 世纪文学发展实际情况以后，笔者将以与家庭子女教育有关的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泰华文学的发展及泰国华人华侨的教育总是被众多外在因素干扰破坏，可谓一波三折。很多青少年的成长，是在社会实践中接受的教育，新一代的青年是在父辈们辛苦的奋斗成果下，坐享其成、挥霍无度，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同时，革命与生存、梦想与希望作为 20 世纪的一个主题词，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在 20 世纪以来的泰华文学的教育小说，存在着两条脉络，一条是揭露家庭教育问题，批判教育弊端，并在批判中寄予华人华侨教育理想的“教育问题小说”，在 80 年代以后达到繁荣。而同时，叙述青少年成长历程的教育小说同样得以发展，主要是在 40 至 50 年代之间开始发展的。由于特殊的社会、地理、文化环境，泰华文学的教育小说与西方教育小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西方的教育小说力图表现主人公的全部生长过程，在较长的时空跨度里，叙述主人公的成长过程，而泰华教育小说只是选取主人公成长的一段，展示在此期间主人公身心的成长。因此中短篇小说成为作家们的最爱，新时期尤为突出。其次西方教育小说建立在批判、对现实不满基础之上，这种思想体现在作品，一方面是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将希望寄托在主人公身上，创造出具有高尚道德情怀的新人，将希望寄托于新人身上，这是一种对生活与未来的积极的态度，在作品中反映为乐观的基调。而泰华教育小说，更多则以阴郁为基调，这一点在泰华文学作品体现得特别突出。这与当时泰国华人华侨作家的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不稳定的现实有非常大的联系，在他们心中，充满着怀疑、焦虑，即使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人形象，他们也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谭真的《座山成之家》座山成一路追求梦想，在各种磨难中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而最终也只是家业衰落，走向死亡。摩南的《茫茫天涯路》甘雅和颂猜的女儿莎丽在畸形的教育下，懵懂无知，思想如同一团浆糊，最终走向了毁灭。

第二节 从泰华教育小说看泰华作家的家庭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给泰华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促成了泰华文学的萌芽。从“五四”开始，泰华文学界就要求文学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教育性，要求文学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生。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

革命家鲁迅正是因为意识到文学的社会性、教育性才决定弃医从文毅然踏上文学之路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疑问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1] (P437)} 由于泰华作家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自觉地担当起“救亡与启蒙”的责任，所以把文学与历史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和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被泰华作家们所重视。救国必须先救人，而改造人、教育人，莫过于文艺。历史的要求决定了现代文学家和教育的紧密联系。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都有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现代教育思想也不例外。西方进步的教育运动发展表明，现代教育植根于现代科学的土壤之上，他们对教育进行了调查研究，对社会、教育、人、儿童、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地认识。尽管泰华教育小说作家们的生活阅历不同、思想来源各不相同，具体教育思想也有千差万别，但在其教育小说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批判传统家庭教育

泰华教育小说作家们很多都是旧的教育思想和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深受其害。二十世纪初的四五十年代，新旧思想急剧交替，人的意识逐渐觉醒，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旧的养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在时代的激流中明显地呈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作家塑造了一批被残酷的旧教育扭曲和变形的灵魂。1952年，在《半岛文艺》刊登了陈衍的《三聘姑娘》。

陈衍（1932-1974），祖籍广东潮州。未受过高等教育，但读书甚多，对文艺怀着浓厚的兴趣。50年代初期，任《全民报》文艺副刊《全民公园》版主编。作品有：连环图小说《彩票姑娘》，长篇小说《三聘姑娘》等。^{[2] (P992)} 他的作品曾经轰动整个泰华文坛，在当时颇具影响。

《三聘姑娘》描写了泰国华人兴记号老板一家的悲欢离合，反映了泰国华人社会的生活场景以及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处在这种家族的种种罪恶和家族的悲剧，追根溯源，很多是由于家庭教育导致的。兴记号老板从一个潮州农村的农民最终奋斗成为泰国繁华地带三聘街的资本家，还娶了姨太太。出身于中国传统妇女的发妻生了大女儿宝珠，年轻貌美的姨太太生了二女儿秀珠、

^[1] 鲁迅. 呐喊·自序[A]. 鲁迅. 鲁迅全集. 第一卷[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 详细的作者介绍请参照: 秦牧等主编,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8.

三舍绍基和四女儿佩珠。作品主题关注在三个人物性格代表了《三聘姑娘》的刻画，展现了婚姻问题和做人问题的借鉴。传统旧家庭教育是专制封建性而带有买卖婚姻的制度，除了不能使自己的儿女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反而常常断送了自己儿女们的终身造成不可挽救的错误和悲剧。大姑娘宝珠性情软弱、颓废、失望、自卑的态度，灰心自己的身世十七岁就死去母亲而在父亲和姨太太专制高压政策下孤独过活，有苦无处倾诉，只有知心的小猫作安慰。她逆来顺受，当她喜欢店里情投意合的司账员黄勉，但因父亲的观念是想借女儿的婚姻壮大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当他知道宝珠和店里贫穷的司账相爱之后，暴跳如雷，最后把司账赶走，宝珠不敢反抗，只是自卑自弃，她毕竟是传统道德观念围墙下又处在新旧时代交替中不幸的三聘姑娘，尤其听到三聘街邻居远近这个要订婚，那个婚姻不成全而自杀，有的自吊；有的私奔；有的被家长打得皮开肉绽，怎不惊怕呢？她后来能与离开去几年的司账黄勉结婚完全归功于四姑娘佩珠与新的心贤张明翰的帮助下才成全的。二姑娘秀珠是个新时髦放荡不羁尽情享受的浪漫作风，是一种恶略的混世享乐的人生态度，她的婚姻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同父亲一样是思想主义的产物，她攀上了有钱的资本家李大荣，她不安分守己，后来知道男方已有个秘密夫人，自己不能再做婚姻登记，最后解除婚约，不但丧失体面，还要偷把肚里胎儿落掉闹成坠落深渊悲剧。四姑娘佩珠有乐观认真的生活态度，对人生充满着热情和进取。从佩珠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华侨青年的新人生观的过程。

《三聘姑娘》反映了传统家庭教育的坠落腐败，兴记号老板固执己见，教育儿女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对诚实软弱的大姑娘宝珠是采取高压政策，引致大姑娘胆怯自卑的悲观态度。对二姑娘秀珠和儿子绍基却放荡自由，放纵不教养，引致儿子在外面乱花乱用，还强奸了女人结果被抓进牢狱。二姑娘每天花容巧貌自恃自己生来好看、漂亮、与好多男人来往，她跟资本家李大荣结婚是为了财产，后来知道对方已经有秘密夫人，自己再不能依法律占有对方的财产终于解除婚约闹成悲剧，绍基和二姑娘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都是父母平日对儿女教育方法错误而酿成的结果。四姑娘还不能作为一个姐们们的完美的榜样，因为她还幼稚，思想还不大成熟，还需要好好的培养与发展。《三聘姑娘》揭露家庭教育问题，批判教育弊端，在批判中寄予了作者对华人华侨的教育理想、教育理念。

泰华作家们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批判了封建传统家庭教育观念和方

法，以及因此所引起的家庭教育的失败和不可挽回的错误。老羊的《花开花落》主人公锡钦兄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过于迷信的人。家里

只要遇到大事，都要去求签、算命，不按实事求是地处理，左右着个人的心情和生活态度。甚至连二十四岁的独生儿子阿大的终身大事也不放过，要他拿恋人的生辰八字请算命先生推算，知道相冲这婚姻就挂浮了，他不肯娶个媳妇来把儿子尅死，认为儿子是邪缠身，要求“伯公”请张符解邪好让儿子早日回家。这是办法吗？一个看来聪明老实的青年，为什么会这样导致父子不和而儿子一次次的离家呢？自己创办的事业没有接班人结果失败这是谁的错呢？

二、家庭伦理道德

在老一辈的泰国华人华侨社会，对家庭教育特别重视，传统的家教主要以“孝”为核心内容，艰苦朴素、戒奢侈，尚谦逊，戒骄浮，这种家庭教育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宣扬传统的道德。可是现代社会家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1952、1953年《半岛文艺》上分别刊登了谭真的《座山成之家》和《一个坤銮的故事》、1956年在丘陵主编的《曼谷公园》上发了的亦非、亦舍、沈牧、匠笔、亚子、东方飘^[1]六人合写的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座山成之家》可以说是《一个坤銮的故事》的姐妹篇，故事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延续性。前一个小说的背景是光绪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期间。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间。泰国社会座山成也就是大富翁成。座山成也是潮汕乡下的贫苦农民，小说描写了座山成10岁时被父亲卖给地主当佣人，十年后逃到泰国独自打天下的故事。最后生意发达，子孙成群，拥有三个少奶，八个少爷的大家庭。

家庭关系、家庭的伦理道德是这篇小说要探讨的主题。家庭关系方面，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儿子间的利益冲突最后加速了家族企业的破产，也使他心力交瘁、最终撒手人寰。小说从座山成的出身、成长、发家过程以及最后的衰亡，都做了全方位的细致的剖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了《一个坤銮的故事》。座山成算是很有头脑的人，生意由小到大、由贫穷到富有，但最终他还是一个悲剧。家庭成员的目光短浅、因为金钱与利益的关系互相倾轧。有人把他家族的衰落归因于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但笔者更倾向于家庭教育失败和家庭关系的破裂、以及家族道德的沦丧导致了座山成的悲剧。

谭真写这两篇小说的视角和独特，把生活中这类带传统观念的华人资本家加以概括描写创造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不为困难所压服、坚忍

^[1] 原名依次为陈英赏、倪隆盛（另有笔名倪长游）、沈森豪、方思若、李庆泉（另有笔名李栩）。东方飘生平不详。

不拔、不求享受和安乐，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佣人成为一代华人的商业巨子。但是，旧式的传统观念毕竟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就因为座山成自己对经济学不熟悉，本想靠去国外留学的五舍回来发展业务，但无奈儿子学无所成，吊儿郎当，贪财诈骗，新时代竞争力强，外资侵入，没选用贤才，只靠妻儿盲目操纵业务，三妻八儿大家庭不和睦，终于被社会淘汰而破产了。

越来越多的泰华作家深刻的审视了子女如何对待长辈的问题。司马攻的《中奖前后》、庄严的《腰龟伯的希望》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感人的故事情节和细腻的语言传达了作者内心对家庭伦理的严肃思考发人深省。《中奖前后》用讽刺的手法刻画了六十岁的秀玲“中奖”前后，家里人对待她的天壤之别。勤俭简朴的腰龟伯在泰国一人辛苦奋斗，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儿媳回家，儿子却因为嫌弃腰龟伯身上的臭汗酸味，和媳妇每天去外面吃饭。腰龟伯最后不满儿媳对他忘恩负义的不孝，失望的承掉金店，卖掉麻绒回唐山老家了。

泰华文学中有许多的教育小说批判了华侨华人虚荣铺张，伪善唯利堕落愚昧。李栩的《陈头家做寿》里，陈头家娘爱面子，让儿子大海定酒楼请戏班为68岁的老廊头做寿，谁知道邀请来的客人多是来吃白食的，大海血本无归，用期票打发各路收账员不成后，只能由头家娘拿出准备预备“百年之后”的积蓄挽回了点面子。而接下来的几天，陈头家三餐只能吃着生日那天存下来的寿面。

泰华教育小说作家们还写了很多虐待长辈的小说，反映了部分泰华青年不尊重长辈、不尽孝道社会现实。倪长游的《祖父的丧事》中，作为在泰国创业的华族代表，“我”的父亲身上集中了新兴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典型性格。“我”的父亲将弟弟和他的父亲与自己合伙经营的公司偷偷的注册为私有，走私贩毒，而且逼死老父亲，不顾兄弟情分，而且还逼迫偿还莫须有的债务。洪林的小说《两代人》、《余生劫》、等既讴歌了小人物的良好品格，又从小处提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尊老敬长传统的失落。

郑若瑟的《示孝道》中，刘太太的女儿富甲一方，又是出了名的孝女。每次为了表孝心，她都要刘太太多吃，吃到肚胀胸闷甚至上医院为止，导致刘太太一听说女儿请客，就有点头痛发怵。这样的孝道，怎能让人接受呢？这是一种带有戏谑性的讽刺，效果比较温婉。

三、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作为国家的、家庭的未来—儿童的成长和家庭教育问题，成为文学家们关

注的焦点。在漫长的封建伦理文化和精神专制中所孕育、滋生和完善的儿童家庭教育程序，以及泰国华人华侨的两重性，已成为现代教育小说作家攻击和贬斥的对象与目标，他们幻想通过文学作品所特有的魅力以及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典型的人物形象，来唤醒麻木、僵硬的灵魂，来建立自己的儿童家庭教育思想。

《座山成之家》中的五舍以富翁的阔少爷自居，荒废学业、贪图享乐，大肆挥霍，座山成不得不连续的汇款接济他家的五少爷。五舍去美国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走入偏邪”，而座山成却已无所知。直到五舍学成回国以后，由于怀疑，他检查儿子的行李，遂才有所发觉。五舍吊儿郎当、诱奸远亲女孩、不务正业、与放荡小姐鬼混、贪污自家公司的钱财，种种的恶性最后父亲座山成怕他给家族蒙羞，断绝了父子的关系。可以说座山成家族的衰落和五舍有一定的关系，可是五舍的堕落和座山成有关系吗？虽然不是他让五舍走向堕落的，但家庭教育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和影响的。在五舍去美国期间他疏于管教，并且座山成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也是导致五舍悲剧的原因之一。

总之，我们从这篇小说中，很明显地看到了一个人艰难的成长历程，在接受教育时期的成长故事，表现一定的教育思想，揭露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弊端，批判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里展现了主人公生长的轨迹，从青年期到成年期，从幼稚走向成熟，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历史的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抒写出了主人公的一生。

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在整个泰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通过描写一个败家子的败家、堕落而后悬崖勒马、重获新生的故事，反映了 50 年代末期泰国华人华侨的社会生活画面，是泰华社会生活的典型写照。故事选取主人公成长中的一段历程，展示了主人公心灵的成长，是典型的泰华教育小说。

破毕舍是曼谷一家姓周的大纱布行的少爷，靠着父母的钱财挥霍无度，整天沉迷于酒色之间。几年就把财产挥霍完了，妻子带着小孩离去，他也沦为乞丐到处流浪。几经磨难，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终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穿着朴素，吃苦耐劳，还挑起了卖豆腐花的担子，最后妻子也回到了他的身边，全家团圆。作者通过描写破毕舍浪子回头的经过，广泛的触及泰华社会的下层平民的现实生活。这里有好人也有坏人，商品经济社会的金钱利益驱使着个别人走向歧途。经不起美色、金钱的诱惑而坠入深渊，家破人亡、断送前程。破毕舍的性格充满着曲折，从寄生走向堕落最后新生，也为小说抒写了乐观的基调，最终给我们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李栩的《父亲》是一篇非常发人深思的作品。作品强烈地批判了儿女的不孝，置父母的生死于不顾。作品的深层含义批判传统孝道的丧失，给我们深刻的启示。阿细狗的爸在家里无米无炊的情况下，顶着老脸去问儿子借钱，结果声名响亮、外貌赫赫的大、二儿子反倒自私自利起来，浪子心肠。反倒是最穷的三女儿来帮助父母。梁风的《太遥远的希望》中，伯父借旅游之名，去美国看他的宝贝儿子，堂兄前几年去美国留学，不知道留到什么学位，平时只知道一味的要钱。伯父就这一个儿子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伯父指望他回来光宗耀祖、继承家业。伯父兴冲冲地去美国以后，反而得到了宝贝儿子的冷淡，洋媳妇只知道让他干活，走的时候堂哥又扔给伯父一张债务清单，最后伯父只能伤心而归。对孩子一味的溺爱，换回的只是儿女的不孝。

父母对孩子既不能百依百顺，溺爱无度，把教育启蒙的职责一味的推向社会和学校，想以为把孩子送到曼谷便万事大吉的祥兴头，后来才发觉家长的地位已经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至于一心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从而指望晚年享清福的腰龟伯更是遭致被遗弃的悲惨命运。对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心理教育问题，夏煌、黄自然、分别在《小偷儿》、《逃学》中表示了深深地忧虑和焦躁不安。梦凌在《阿狗嫂》中痛斥了收杂货为生的阿狗嫂的儿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嗜赌成性，经常辱骂吆喝阿狗嫂，甚至拳打脚踢。邻居愤愤不平，反而招来阿狗嫂的瞪眼。最后阿狗嫂因为杀了自己的儿子被捕，原来她的儿子想强奸她。

第三节 泰华文学作品中家庭教育观念

“家庭教育观念是家庭教育的本质属性在父母头脑中的反映，一般是指在父母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在孩子发展、教育等方面所形成的特有的观点。”^[1]^(P148)具体地讲就是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目的、意义、作用，对孩子学业、就业的期望等方面的认识和观念。一定的家庭教育观念，对亲子关系的形成、对家庭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产物，特定家庭环境、条件和氛围长期积淀的结果。家庭教育观念一旦形成，便具定的稳定性，并带有超前或滞后的特质。积极的家庭教育观念对家庭教育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泰华文学作品中家庭教育观念对了解华人华侨家庭教育的现状，对有效地推进家庭教育的发展十分必要。笔者从教育观、儿童观、人才观三个方面来考察泰华教育小说中反映的作家的家

^[1] 关颖. 社会学视野中的家庭教育[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庭教育观念。

一、教育观

教育观主要指父母对家庭教育在子女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父母对自己的角色和职能的认识。那么在泰华文学教育小说中父母的教育观是什么？父母对家庭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怎么认识的？

摩南的《人间垃圾》主人公余小琴小时候在英文学校读书，常常故意搞问题，过分不安静，经常惹是生非，总是让老师操心，她一直告诉她同学以及她的级任老师，说她是父母亲最不疼爱的孩子，但父母亲知道后没有重视，认为是小孩的偏见，她终于变成了两面人，有时好，有时坏，而抱着只想报复的心情闹成生命毁灭的悲剧。

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把小琴的父亲叫来，可是她的父亲却说：“学校是管教学生的地方，小琴的种种行为总括起来，不过是不专心、好动、并没有犯大错，学校教师如果不能纠正不守规矩的学生，不能教育学生，那么我们送孩子来学校做什么？学生如果是清一色的乖宝宝，也就看不出教师的能力了。”教务主任庄先生说：“我很抱歉我们的学校教师没有办法教导你的女儿，所以我才请贵家长来和我们一起磋商，大家要合作，家庭与学校，双管齐下，才能把小琴的乖戾性格改正……”

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的三个渠道、三大领域，虽然它们在教育全过程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却从不同的侧面教育着同一对象。要想提高教育的整体效应，三者必须形成一种正向的合力，即三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在正面培养的基础上各有侧重。余小琴的爸爸认为“学校负责教育，家庭负责养育”；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家长忽视家庭教育。尽管近代几十年泰国华人华侨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但传统的重视家庭教育的观念，仍然有一半多的家长教育子女的知识是通过自己教育子女或父母对自己教育过程中得到的，这种由感性理解而来的知识，可能由于家长对自己孩子的熟悉而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在目前这个日益开放、变动的社会，这种带有封闭性的家庭教育知识已经不适应了。

二、儿童观

在现代教育条件下，儿童是人，家长就应该平等地对待他，尊重他。儿童是成长中的人，家长就应根据孩子成长发展的不同时期的特点科学施教。儿童是终究要成为独立生活的人。那么家长就应按照“独立生活”这个目标去培养

他。父母忽视儿童主体地位、片面强调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观念是十分有害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家长武断自负的想法不仅会伤害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一些错误的决定还有可能给家庭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李翎的《在警署上》里批判了富有的“父亲”，为了家族声誉，为了那些所谓的贫富观念、等级观念、门当户对观念逼迫女儿与男友私奔，最后还逼着女儿做伪证。“女儿”反抗着对爸爸说：“爸，你尊重女儿点，你不要说好不好，我已经长大了，我读过大学，我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要的是自由，我要的是乐趣……”

卢永光的《五岁孩童、爱国如命》中，五岁的小金和父母参加“泰人助泰”大会，当他看到父母亲无私地献出金饰和 200 美元，别的叔叔阿姨都为振兴国家而贡献力量的时候，小金突然对妈妈说他不吃点心，要把钱省下来帮助国家。妈妈暗中高兴，五岁孩童，爱国如命。父母亲尊重孩子，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孩子学习的榜样。

邢爱周的《生财有道 教子有方》一文中，翠蓉姐结婚十年，便有了七个儿女，但此时丈夫得了怪病，一命呜呼。翠蓉姐振作精神，母兼父职，指导儿女大的照顾小的，按自己的能力每个孩子分担一部分家务，她分出时间做生意。

“翠蓉姐的家教很严，无论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都要听她的话，不得行差错，鼓励孩子要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出头的日子，懈怠是永远没有出息的，所以随时严督孩子，力争上游。孩子在外面玩是允许的，但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回家，不得任意在外边游荡学坏，否则必被鞭打责罚。”
(引自邢爱周的《生财有道 教子有方》)

“翠蓉姐”重视孩子们的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孩子们各个力争上进、品学兼优，是她教子有方的结果。

三、人才观

人才观一般是指家长对人才价值的观念和对子女们成才的价值取向。家长对人才价值的观念，决定着其对子女成才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其对子女的期望。

在泰华教育小说中，作家们表达了自己对子女们成才价值的取向。大部分华人华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更高的学历，回来继承家族的事业。老一辈的华侨因为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大多因为某些

原因，远离祖国，独自打天下，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拼出了自己的天地，因此当他们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害怕子女走自己的弯路，所以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很多有钱的华侨家庭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国外接受教育，这在泰华教育小说中屡见不鲜。

曾心的《蓝眼睛》中，大儿子考上美国哈佛大学，全家喜不自胜。卢永光的《浪子回头》一文中，为了让孩子念书学文化，接受祖国传统的文化骄傲与儒家伦理道德等观点的熏陶，所以父母把仅仅六岁的小龙送往曼谷学习，但这也造成了小龙成长期间父母教育的缺失，姑母毕竟不能代替父母的地位。当然，也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和他们一起做生意中途辍学，饶公桥的《煲猪脚和叉烧肉》中，“老陈”的女儿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让她帮忙店里买卖、收数、记账等工作。儿子还没有毕业便叫他停学送去学习修理摩托车。李栩的《头家发》里，父亲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曼谷读书，儿子却放浪形骸，这在泰华教育小说中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不是偶然。

年腊梅在小说《新生》中，用娴熟的笔法描写了贤惠勤劳的婉妮，由于丈夫失明，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天早早的把婉妮叫醒，然后做全家的守门人，婉妮独自承担起全家的生活负担，由于孩子多，疏于管教，大女儿最后跟男人私奔。婉妮和丈夫由于文化水平低生了好几个孩子，其实他们并不想生。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在大妹的工友巧珠的劝说下，婉妮为了不让她的孩子们像她一样一个字也不懂，也让二妹和阿愚去夜校读书。并且在老师和家庭计划协会的帮助下终于做了绝育手术，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

钟飘扬的《余孽》里，“弟弟”公司的出口生意搞得有声有色，但是选择与使用人员很难得心应手，因此几次到“我家”说服“我”让孩子到外国留学，学成归来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于是“我和老伴”决定让孩子多增强一项对他们的前途有用的才能，最后决定让俩个儿子都到澳洲堪培拉读书去。最后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大儿子与自己的同学结婚，事业蒸蒸日上。二儿子后来成了“弟弟”工厂的外事部主任，共同发展业务，鼎盛兴隆，众望所归。